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王水照主编

苏轼“和陶诗”考论

——兼及韩国“和陶诗”

金甫喙 著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王水照主编
本书系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苏轼“和陶诗”考论

——兼及韩国“和陶诗”

金甫暻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韩]金甫暾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3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王水照主编)
ISBN 978-7-309-09513-5

I. 苏… II. 金… III. ①苏轼(1036~1101)-宋诗-诗歌研究②诗歌研究-韩国
IV. ①I207.227.441②I312.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7845号

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

[韩]金甫暾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90 千

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513-5/1·742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

王水照

2011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书稿,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六人集”。这个想法源自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古语云“三十而立”,在这三十年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成为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从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出版,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第二,新世纪以来,由于博士生的扩招,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学术著作的出版较之以前容易许多,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有埋没精品之虞。过紧或者过滥,都不是健康的学术出版生态,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图书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及时从中遴选一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能够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

我的建议很快得到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他们都纷纷将自己

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简单来说有三种常见模式,即个案研究、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就其生平、交游、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究;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代,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历史还原等等。这三种选题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对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化,都还大有可为。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五朵金花”。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文学”的展开思路。我一直认为,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打工”的。与此同时,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的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畛域,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本套丛书收入了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曝《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种著作。朱刚、李贵、成玮的著作,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特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有着“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写了十余篇相关

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之说有所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历时十余年的修订,较之其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在他刚刚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学界相关论著还比较少,若干年过去了,“中唐—北宋”的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学界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值得庆贺,对李贵来说恐怕却是无形的压力。不过这部书稿雄辩地证明,好学深思的他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力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该书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与李贵的论题有些重合,但却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他在上编抓住诗学观念、文人分布和诗体发展三个重要因素,从制度、思想和文学的互动关系入手,清晰地描述出宋初三朝诗坛的具象图景。在下编则选取欧阳修作为描述框架,通过辨析欧阳修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或疏离,展现出仁宗朝诗坛的历史现场。这对于深化北宋诗歌研究,特别是对于探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甫暲、陈湘琳、侯体健的著作则是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分别涉及苏轼、欧阳修和刘克庄三位宋代重要的文学家。虽然都是个案研究,他们的方法却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个案研究的不同范式。金甫暲是韩国学者,他选取的切入点比较

小,《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一书就苏轼“和陶诗”的形式、内容、背景、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获得了不少与前人同题研究不同的具体结论。其中对韩国“和陶诗”相关资料的辑录和论述,更给国内学界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资料,这对于认识东亚汉字圈的文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

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一书表现出女性学者特有的敏感和视角,注重“美感经验”的发掘,对面向内心的欧阳修的情感体验、地域记忆、空间书写、生命底色、文化风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该书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运思精细,阐微发覆,以“细读”和“体察”的方法,从大量文献中摹画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欧阳修,并将这种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北宋文化整体的发展局势暗自勾连,跳出了原有研究窠臼,是近年来欧阳修研究的一大收获。

如果说陈湘琳的个案研究是“内省式”,侯体健的则可以说是“外烁式”。《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一书,吸收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关注到相邻学科的前沿与热点,从“晚宋文学生态”的大背景入手,展开对刘克庄周围世界与环境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凸现出刘克庄文学世界构成中的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复杂因素或基础,这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刘克庄和晚宋文学研究中可谓独辟蹊径、另具手眼。该书的研究框架和目录设置,也别出心裁,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是个案研究模式的新探索。

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无非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与新观点。本套丛书除了朱刚的之外,其余五部都是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是他们的处女作,也是他们向学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这六部书稿自然不是十全十美之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老师审读学生辈文稿,本应优点说全,以资鼓励,缺点讲透,俾便精进。这篇序文信笔写来,却多为褒饰之语,不免自夸之嫌。但我自信并非空洞赞扬,未违“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他们所作的可贵的学术努力,在新材料的发掘、新

方法的运用、新视野的拓展、新观点的提出诸方面,均已提供的不宜轻视、值得玩索的学术内涵。

我和六位作者都有师生之谊,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复旦园中共探学问之道,往事历历,犹如昨日。如今,我们或隔海相望,或同系共事,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我倍感欣慰。不过,治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他们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目 录

引言	1
一、研究动机	1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2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	5
 第一章 苏轼“和陶诗”概况	9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的概念、形式及流传	9
一、“和陶诗”的概念与范围	9
二、苏轼“和陶诗”与原作形式上的比较	11
三、苏轼“和陶诗”的流传过程	16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的总数	25
一、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一百二十四首说 ...	25
二、各版本所收的“和陶诗”数目以及诸家之说	27
第三节 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与苏轼“和陶诗”系年	34
一、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上)	34
二、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下)	45
三、余论	55
附录一 苏轼“和陶诗”系年表	57
 第二章 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	59
第一节 苏轼的次韵诗创作	59
一、苏轼次韵诗概况	60
二、元祐以降苏轼的次韵诗创作情况	68

第二节 苏轼的陶渊明接受	71
一、始发期至骤转期	71
二、回旋期至高潮期	75
第三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文学史、文化史背景	81
一、中唐至北宋后期的次韵诗创作	81
二、苏轼以前的陶渊明接受	89
三、时运的成熟	99
 第三章 苏轼“和陶诗”的内容	 105
第一节 生活记事	106
一、居住与饮食	108
二、过节、交往、出游等	113
第二节 亲友情深	118
一、骨肉之情	118
二、友情	125
第三节 论史评人	129
第四节 哲理	137
第五节 士人心态	151
一、归隐情结	153
二、淑世精神	162
第六节 《和陶桃花源》与《和陶归去来兮辞》	173
一、《和陶桃花源》	173
二、《和陶归去来兮辞》	178
第七节 小结	182
 第四章 苏轼“和陶诗”的成就	 185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	186
一、苏诗平淡诗风的完成	187
二、本色的体现与其意义	196
三、因难见巧	210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的思想成就	216
一、出处矛盾的解消	217
二、超凡脱俗、超越生死	223
三、和而不同	235
第三节 小结	243
 第五章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意义与影响	248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意义	248
一、对苏轼个人的意义	248
二、文学史、文化史上的意义	251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影响	257
一、中国历代的“和陶诗”创作	258
二、韩国古代的“和陶诗”创作	262
附录二 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情况表	279
 参考文献	286
附录三 韩国“和陶诗”	301
后记	473

引言

一、研究动机

苏轼(1037—1101)是北宋诗坛的领袖,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人其作的研究都很活跃。但“苏海”里面,还有很多地方等待深入的探究。

据孔凡礼先生点校本《苏轼诗集》,现存的苏诗大约有两千七百馀首。其中,和韵诗占了很大比重。金代王若虚说:“(东坡)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滹南诗话》卷二)^①和韵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形式。和韵诗历来一般用于同一时代文人之间的酬答。因此,几乎没有人运用和韵的手法来追和古人的诗歌。而苏轼终于突破这个局面,开创对古人诗进行和韵的新范式。他在给苏辙的一封信中云:“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②苏轼所谓“追和古人”就包含着和韵的因素。而苏轼的追和古人几乎都体现在追和陶渊明诗上。苏轼最初在知扬州时(元祐七年)写了《和陶饮酒》二十首,隔了一段时间,在惠、儋贬谪时期,集中地、有意识地创作其余“和陶诗”。

苏轼开创追和古人的范式,并且全面地追和陶渊明的诗歌,留下一百馀首“和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不过,由于对和韵的否定性成见,历代文人对其“和陶诗”的评价,

①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1年,第515页。

② (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第1882页。此书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本(道光二年武林韵山堂王氏原刊本)作为底本。本书下面称“《苏轼诗集》”就指此书。

虽有一些称赞,但更多的是批评。近代以来,这个情况没有什么改观,文学史家对它的态度还是较为冷淡,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还不够充分。

苏轼“和陶诗”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且它还涉及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再认识,以及苏轼晚年诗风变化的问题等。另一方面,苏轼开创“和陶”范式以来,历代文人不断地追和陶诗,蔚为大观。甚至韩国古代文人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和陶”之作。无论这些诗人是否有意识地继承苏轼,他们都可以说受到苏轼的影响。然而,不仅这些历代“和陶诗”与苏轼“和陶诗”之关系的研究比较鲜见,就是对历代“和陶诗”本身的研究也寥寥无几。总之,笔者认为苏轼“和陶诗”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因此,以此作为研究课题。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历代均有许多人关注这个独特的创作现象。概而言之,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原诗无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由此,古代评者大都特别留意原诗与和诗之间的“似”或“不似”。而由于评者之间的视角差异,随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褒贬之论。或者称颂其相似,或者批评其似而终不近,或者赞赏其中的个性或独创性等等。

近代以来的研究也基本上继承这些观点。而早期研究对苏轼“和陶诗”的评价有较多否定性意见,如胡云翼先生在《宋诗研究》(1935年)中认为,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全是为了“卖弄才气”,“想和陶潜争胜”,但结果是“东坡的‘和陶诗’也并不曾摸着陶诗的边际”^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里,苏轼“和陶诗”面临了更为严厉的批判。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苏轼)有艰涩拖沓的毛病,逞才使气更是苏轼的

① 胡云翼《胡云翼说诗》,刘永翔、李露蕾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173页。

一个缺点,和一下陶诗,便是四卷一百馀首,难免有些硬诌凑数的”^①。显然,这种批评偏重于对表面形式的考察,露出了忽略作品所反映之思想内容的致命弱点。

此后,开始出现肯定苏轼“和陶诗”艺术价值的研究。如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采取逐首比较的方式,在对陶、苏二公诗进行比较之后,充分肯定苏轼在“和陶诗”创作上反映出自己本然的面目,最后赞扬其“不托人篱下之风概”^②。朱靖华在《论苏轼〈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中,也主张苏轼的“和陶诗”绝非模拟之作,而是“借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③。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继承清代纪昀的“时时亦自流本色”、“颇参己法”或者王文浩的“但以陶自托耳”等古人的观点(详见本书第四章)。除了宋、朱二人的研究之外,还有许多研究者也继承这种观点,不但肯定苏轼“和陶诗”成就了与陶诗相似的境界,而且更加重视苏轼“和陶诗”个性体现的一面。不过,如果过于强调苏轼“和陶诗”的个性或独立性,可能会减轻苏轼为了学习陶渊明而创作“和陶诗”的本来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王水照师的观点是很有见地、不偏不倚的。他在《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中说:“陶诗实在是不能学也是不可学的,然而苏轼却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学习方法,即学与不学之间的不学之学,贵得其‘真’,重在获‘意’。他不追求个别思想观点的附和,更不拘泥于外在风格、字句的摹拟,而力求在人生哲理的最高层次上契合。”^④又说:“我们更看到两位异代知友促膝谈心,站在对人生妙谛领悟的同一高度上,共同真诚地探讨求索。在人生哲理妙悟层次上的高度吻合,这是两人‘神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55 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第二册第 409 页。

② 台湾东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75 年。这篇论文后来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书,本文参考了 1982 年 10 月初版本。

③ 朱靖华《论苏轼〈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苏轼论》,京华出版社,1997 年。

④ 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05 页。

似’、‘风味’之似的最好说明。”^①本书从王先生这种说法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对苏轼“和陶诗”的研究主要以单篇论文或专著的一部分的形式问世。据笔者的资料搜集,2008年11月拙稿《苏轼“和陶诗”研究》问世之前,以苏轼“和陶诗”为专题的学位论文仅有四篇:李欢喜《论苏轼的“和陶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2000年)、朱小枝《苏轼之道的诗性阐释——对苏轼“和陶诗”的一种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2004年)、曲晓华《苏轼“和陶诗”创作及其学陶心态研究》(复旦大学硕士,2006年)、杨玲《苏轼“和陶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2006年)等^②。中国台湾也有几篇学位论文。除了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之外,还有陈英姬《中国士人仕与隐的研究——以陶渊明诗文与苏东坡之“和陶诗”为主》(台湾师范大学硕士,1983年)、金文洙《苏轼“和陶诗”研究》(东海大学硕士,1999年)、黄蕙心《苏东坡“和陶诗”研究》(辅仁大学硕士,2001年)^③。此外,不但在中国大陆,而且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也有不少有关苏轼“和陶诗”的单篇论文^④。这样,关于苏轼“和陶诗”的研究,就数量而言,不算很少。但是,本书认为苏轼“和陶诗”还有很多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清代的编年注本,特别是依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者最多。王氏此书对于以往的苏轼“和陶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和陶诗”总数、编

① 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苏轼研究》第106页。

② 此外,徐宇春《苏轼唱和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2006年)、赵戎《试论苏轼诗中的“陶渊明”情结》(陕西师范大学硕士,2007年)等也有专门论述苏轼“和陶诗”的部分。

③ 韩国的学位论文有曹圭百《苏轼的〈和陶饮酒诗〉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1985年)、金润美同一题目的论文(成均馆大学硕士,2002年)。

④ 中、韩、日三国有关苏轼“和陶诗”的单篇论文,这里不一一介绍,有些论文在本书下面的论述中会引用。

年上,人们大都跟从他的说法。因此,王氏的说法几乎成为学术界的通说。不仅如此,王文诰对于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以及与陶渊明原作的关系等,曾经提出过一些看法,而这些看法也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接受。但实际上,这些通行的说法,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二,在考察苏轼“和陶诗”创作背景的时候,过去一般只停留在对于苏轼个人微观背景的考察,对其创作背景的宏观性研究不多。

第三,研究者在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思想内容和成就的时候,大部分只举出若干首颇具特色的作品,以当做其论据而已。尤其是许多单篇论文因篇幅局限,其中所涉及的作品就很少,因而不能够充分地反映出苏轼“和陶诗”多样的面目。

第四,不论对苏轼“和陶诗”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研究者大都对于苏轼运用次韵(和韵的一种)手法,表示遗憾,甚或加以批判。尽管有很多研究者,表扬了苏轼在“和陶诗”创作中所体现的娴熟的艺术技巧,但是他们也几乎没有更为积极地给苏轼选择这种制约颇多的作诗手法以肯定性的评价。仅有少数研究者肯定了苏轼选择次韵手法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第五,如上所说,苏轼之后,中国历代文人延绵不绝地创作了“和陶诗”,并且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韩国古代文人也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和陶诗”。而过去研究苏轼“和陶诗”的人,极少探讨苏轼“和陶诗”创作对于中、韩两国的历代“和陶诗”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如此看来,苏轼“和陶诗”还有很多地方等待后人深入研究。更何况,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网罗这些内容的综合性研究。因而,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探究,以期作出更为完善而全面的研究。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

苏轼“和陶诗”自然与陶诗有脱不开的关系。因此,研究苏轼

“和陶诗”不得不探讨其与陶渊明其人其诗之间的关系。不过，如以往的研究多次讨论的那样，苏轼“和陶诗”中有不少地方呈现出与陶诗不太相似的面目，甚至有些作品，除了押韵以外，似乎与陶诗毫无关系。这些情况引起了许多有关“似”或“不似”的争议。但需要指出的是，拘泥于“似”或“不似”的问题，研究者会过度留意陶渊明原诗，间或会陷入拿衡量陶诗的标准来衡量“和陶诗”的误区，这将使得我们不能深入探讨有关苏轼“和陶诗”本身的问题，同时不能客观地评价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事实上，苏轼“和陶诗”并不完全附庸于陶诗，其本身也具有作为独立诗歌的完整价值。只是因为苏轼写“和陶诗”的时候，学习陶渊明的意图非常明确，所以苏轼“和陶诗”与陶诗有很密切的关系而已。假如苏轼只想次韵陶诗，不关心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和思想精神，这也并不是不可以的。由此看来，我们在对于陶渊明原诗与苏轼和诗之间进行比较之前，必须充分考察并探讨苏轼“和陶诗”本身。

至于原诗与和诗之间的关系，前人已经作出了比较可观的研究，如宋丘龙先生《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对于每篇原诗与和诗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比较。宋先生在逐首比较的基础上，又于“结论”中作出较为简单的总体比较。这种逐首比较的研究在苏轼“和陶诗”研究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至少，这种研究让我们不必再拘泥于个别作品之间的“似”或“不似”的问题，可以直接进入更为深刻的总体比较。因此，本书尽量回避逐首比较的方式，拟在全面地研究苏轼“和陶诗”本身的基础上，对于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关系，进行更为详细的总体比较，进而从中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成就问题。

从宋代到清末，收录苏轼“和陶诗”的版本甚多，各版本的收录情况很不相同，不仅在文字方面有些出入，而且在作品数量和编次上也呈现出颇为不同的面目（详第一章）。其中宋刊“东坡七集（或六集）”系统的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今存